

世纪末的预警：《时震》的创伤性解读

◎林紫薇

摘要：在 20 世纪末、世界格局日益错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后现代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采用科幻小说的形式，在自身创伤经历的基础上完成了小说《时震》。通过对作品的创伤性解读，分析人类在受创后自我疗愈的途径，可以帮助读者认识到冯内古特创伤书写背后的后现代人道主义精神，挖掘动荡社会格局之下的出路。

关键词：《时震》 库尔特·冯内古特 创伤书写 精神创伤

在《创伤与复原》一书中，美国心理学家朱迪斯·赫尔曼将创伤疗愈的复原过程详细分化为三个步骤，即：“受创主体需要在建立一种生活安全感的基础之上，对过去的创伤进行哀悼，最后还需要创伤主体与自我进行和解。”作为一名亲历二战的老兵，冯内古特身上不仅承载着难以磨灭的战争创伤，还包括其成长经历中亲人相继离世的家庭创伤与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战后社会环境动荡不安的文化创伤等，而他也自然有着异于常人的自我疗愈途径。通过“记忆之场”的建立与“自我虚构”式的创伤书写方式，冯内古特最终实现了从暴露自身的创伤到直面创伤的复原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过去创伤的和解、与受创自我的最终和解。

一、暴露创伤：“记忆之场”的建立

“记忆之场”一词源自 1984 年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国民文化史著作《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一书。鉴于这一术语在其发展过程中被人广为传用，这一原本由历史学应运而生的术语变成了一个流行词汇，并衍生为一种物质性纪念场所的代名词。“虽然‘记忆之场’全然脱离了诺拉的掌控，但是它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即：它成了一种具有公共使命特征的公众表达方式。”“记忆之场”不仅演变成一种切实存在的场所，同时也兼具了两种属性，即：象征性和功能性。即使诺拉本人也没能给出“记忆之场”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从其表述看来，“记忆之场”就是围绕着记忆标的而形成的各种记忆的集合，它既可以代指某种切实存在的实体，又可以代表某种情感的象征物。

在小说《时震》中，暴露创伤不仅是

冯内古特疗愈自身创伤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作家逐渐接纳、理解、重组自身创伤的一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受创主体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作为二战战场上的情报侦察兵，冯内古特虽然没有开枪杀过敌人，但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侥幸死里逃生的战争创伤却构成了他一生难以治愈的精神伤痛。在冯内古特的笔下，第一类“记忆之场”便囊括战犯身上佩戴的铁十字勋章、战友戴维因炸毁德国人坦克获得的铜质奖章、特劳特身上穿着的战时分配的凉鞋等物品。在特劳特基于真人真事所创作的《掩体里的宾戈游艺会》中，许多深藏在地下的纳粹分子身上都佩戴着一种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德国只授予在战场上表现出极度勇敢精神的人，而这样的勇士足以列入精神变态者之列。希特勒佩着一枚，是他在西方文明第一次自杀未遂企图中当下士得来的。”作为一种有形实体，这样与战争相关的荣誉勋章不仅侧面体现出一战时德军作战时的残忍，而且自然而然地诱发了叙事者“我”关于西方文明第二次自杀未遂时的战争回忆。于是，叙事视角便由第三人称猛然转为第一人称内视角，叙事者“我”也开始回忆起自己深处二战战场时的经历。“像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开过枪。也许希特勒也从来没有玩过这个大把戏。”而“我”作为一名情报侦察兵，只是负责到我方尚未占领的区域，侦察敌情。在遇到敌人时，主要不是同敌人厮杀，而是要潜藏隐蔽起来，保存自己，以便向上级汇报敌情。虽然“我”并没有杀过人，却也颇为讽刺地因长了冻疮而获得了一枚勋章。这枚紫心勋章并不只是一种空洞的战争符号，而是一种承载着许多来自战时黑暗的、不可磨灭的

记忆的有形物，与德国士兵身上的铁十字勋章一样，是被战争创伤侵扰、被杀人经历折磨的战后老兵的一种有形化的受创证明。连“我”这样从未在战场上杀过人的侦察兵，在战争结束之后回到家时，听到叔叔的一句“你现在是个男子汉了”这种莫须有的夸赞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险些杀死一个德国人的战时阴影，可想而知一枚小小的铁十字勋章背后又背负着多少条遇难者的性命。

在小说《时震》中，冯内古特笔下的第二类“记忆之场”便是关于二战的照片式回忆与重建。在《创伤与复原》一书中，朱迪斯·赫尔曼提出：“重建创伤故事应该从创伤事件之前开始，运用陈述事实的方式重构创伤事件：从冻结的影像碎块、僵化的感官片段中，受创者要慢慢组成一个统合、详细的（口述）记录，并且需要有正确的时间和经历背景。”照片式的创伤重写能够将叙事者“我”的个体创伤经历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而重建的创伤故事也作为另一种“记忆之场”，唤醒了“我”关于二战的回忆。在第三十五章，“我”从对于单击者和扫射者的讨论，到将擅长单击的作家形象比喻成“正在冲破门墙围栏，从有刺的铁丝网中辟出一条通道，冒着炮火和毒气探索问题的答案”，再转到了自己与特劳特在二战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并开始重建德累斯顿大轰炸时的创伤片段。在“我”亲眼见证了四千万人的死亡之后，德国便投降了。1945 年 5 月 7 日，“我”与战时伙伴伯纳德·奥黑尔，还有德累斯顿其他的上千名战俘被无罪释放后，在废弃谷仓中寻找食物时，却意外地见证了一名最为残忍的纳粹党上尉的临终之际。在小说中，像这样碎片化的、关于战争的回忆还有多处，都

是冯内古特借由叙事者“我”的视角穿插在文本中的战争创伤事件的重建。

二、直面创伤：“自我虚构”式的创伤书写

在《创伤与复原》中，赫尔曼提出了受创者在疗愈过程中的两大通病。“治疗中最大的通病就是逃避与创伤相关的事实；第二大通病则是在尚未充分建立患者的安全和巩固治疗联盟前，就贸然探究创伤的细节。”虽然对于受创主体而言，有意识地规避与创伤事件相关联的事实可以短暂性地排解自身躁动不安的消极情绪，但是这些隐藏的创伤会如同定时炸弹一样在未来的某一瞬间彻底爆发，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使得创伤患者的症状恶化。对于被二战经历折磨的冯内古特而言，只有直接面对自己的创伤性经历，并将这些碎片化的经历融合到自己的创伤书写过程中，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的走向复原，从家庭、战争、文化创伤的侵扰中找到出路。

从语言学中构词法的视角来看，自我虚构(auto-fiction)一词是由“自我”(auto)和“虚构”(fiction)组合成的复合词。1977年，法国著名小说家塞尔日·杜勃罗夫斯基所出版的非评论性处女作《儿子/线索》中首次提出了“自我虚构”这一概念。“‘自我’(auto)说明的是写作内容，即关于自我的书写，而这一前缀自然令人联想到自传(autobiographic)，而‘虚构’(fiction)说明其中有创作的成分和风格的体现。”在杜勃罗夫斯基看来，“自我虚构”是一种以完全自传性内容为题材、以完全虚构作为写作方式的叙事作品。换言之，自我虚构是一种介于真实性自传与虚构性小说之间的另一种文体，是一种将传记题材与虚构性文学有机融合的综合体。自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后，这一术语引发了文学评论界的热议，而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分为两派：“一类强调的是该词的前缀‘自我’所暗示的参照性和真实性；一类突出的是词根‘虚构’，也就是作品的虚构性和小说特征。”从小说《时震》出发，冯内古特采取的是“自我”与“虚构”有机结合的叙事方式，将虚构建立在残酷的现实基础之上，进行自己的

创伤书写与自我疗愈。

在冯内古特的创伤书写中，自我虚构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的选择，更是一种走向自我疗愈的文学方式。“作为一种填补缺憾的写作方式，自我虚构可以帮助创伤主体宣泄内心的伤痛，如：战争带来的震动、亲人死亡的悲恸、疾病的痛苦、情感的孤寂以及身份的错位等。”在20世纪30年代成长起来的叙事者“我”不仅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引发的沉重物质打击，还有青年时期的二战经历与德累斯顿轰炸事件也造成了冯内古特一生难以逾越的可怕回忆。面对无法言说的家庭创伤与战争伤痛，他以“自我虚构”式的书写方式排解自己内心的黑暗回忆。在塑造自己的代言人——科幻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时，作家在其身上倾注了许多自己的亲身经历，甚至直言“特劳特其实并不存在，他是我的另一个自我”(序言)。可以说，特劳特被赋予了强烈的冯内古特式自传色彩，他不仅有相似的家庭创伤，也同样是一名二战老兵。通过侵入式的叙事手法，冯内古特在文本中构建了文本中的另一个自我，即：叙事者“我”。在序言部分，作家便以“小库尔特”的身份闯入文本中进行叙述，而从“我”的视角阐述的大量事实都近乎与现实生活中的库尔特·冯内古特本人的生平完全重合，仿佛是冯内古特本人在与读者喋喋不休自己一生的琐事，这增加了小说中的“自我”部分；而“虚构”部分则主要由特劳特以及时震大背景下的各类角色构成。

三、创伤疗愈的现实意义

自古以来，创伤一直与人类社会平行发展。人类的历史仿佛是一部由无数不可避免的灾难所组成的创伤史。作家透过文学创作记录、疗愈自己的个体创伤，因而这类创伤文学也肩负了一定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一方面，历史是小说叙事的背景，同时也是作者的叙事动机与创伤根源。冯内古特通过历史事件来展现小说中的叙事者“我”与其他人物是如何遭遇、忍受个体创伤的；另一方面，通过作家独到的叙事策略，读者能够更为深入地领略到叙事者与小说中角色所经历的创伤体验与创伤

后遗症，并且在揭露伤疤的同时，作家又披露了由自身创伤引发的、对彼时以及未来人类社会问题的反思与关切。

(一) 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和为贵思想

作为一名二战老兵，冯内古特在小说中不仅表明了自己反对战争的态度，而且表明了自己对于原子弹、氢弹等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滥用的恐惧与审慎态度。在序言部分，作家便强调了现实世界中枪支等武器是随处可见，甚至于是唾手可得的一种失控状态。“各种枪支的使用就像是打火机一样方便，价格像面包片烤炉一样便宜，任何人有杀人的念头，想杀父亲或法茨或亚伯拉罕·林肯或约翰·列农或小马丁·路德·金或一个推婴儿车的妇女，都只是举手之劳。”甚至于冯内古特的代言人，特劳特，都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用以隐喻枪支这一类军事武器的普遍化，连“亚瑟王身边心智最纯的加勒哈德爵士都学会了这一迫人为善的新式器械。”(序言)的确，人类的生存不仅对于水源、空气与表土产生极大的威胁，而且人类所制造的“越来越高效的毁灭性武器”对于人类自身也产生了极大的安全威胁，甚至于老科幻小说家特劳特都坦言道：“这样的发明足以向每个人证明，活着是烂屎一缸。”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以“理智”之名，把自己的橄榄球场改建成了一家核弹工厂；在首次铀裂变成功后的第五十三年，即：1995年8月6日，一群人集聚在教堂中，只为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五十周年；甚至于为失去理智的苏联制造氢弹的“圣人”安德雷·萨哈罗夫可以仅凭自己呼吁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光荣”事迹，在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他的妻子，一名真正救死扶伤的儿童保健专家，所获得的成就却不能与他相提并论。冯内古特在文中反问道：“人权？还有什么能比氢弹更无视任何形式的生命权利？”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萨哈罗夫1987年获得了斯塔滕岛学院的名誉博士头衔，而作为始作俑者的萨哈罗夫留给世人的仅仅是一句简单的“不要对核能表示绝望”的苍白忠告，但他所研究的核能却引发了这个星球最为严重的核泄漏事件——切诺贝利核泄漏。当

人类以进步之名进行科学研究，尤其是毁灭性武器的研究与应用时，这种技术的应用远远比预期的更危险。鉴于人类手中掌握了太多的技术与权利，尽管人们本意是向善的，但是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造成灾难性后果。这种恐惧源于世界末日文学，通常围绕着原子弹的发明，一种武器可以大规模的杀戮，也可以让城市只用一颗炸弹就完全毁灭。

诚如冯内古特在小说中所言：“核能使人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痛苦，在由两个半球组成的地球上生活使我们的土著人失去了往日的欢乐，也没让‘发现’土人、创造车轮和字母的人们变得比以前更热爱生活。”在特劳特创作的《不开玩笑》中，他虚构了一颗继广岛、长崎以后美国向日本投放的第三颗原子弹，一颗“像中等规模初级中学地下室里的锅炉那样大小的紫颜色家伙”，而投放这颗原子弹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是仅仅出于炫耀本国军事实力与对日本的政治威胁的需要。彼时的飞行员与投弹手早已经杀红了眼，“在前几次执行任务时感到自己像神一样”。

(二) 反对科技、呼吁人类主体性的勒德主义思想

在小说中，冯内古特以叙事者“我”的口吻坦言：“作为一个至死不渝的勒德分子，就像基尔戈·特劳特，就像纳德·勒德，我至今坚持使用一台手动打字机。”勒德主义得名于1779年英国的一名织布工纳德·勒德，他为抵抗工业革命致使大量纺织工人失业的境况，捣毁了两台织布机。勒德主义代指对新技术持质疑甚至抗拒态度，相信使用科技会导致负面道德和社会影响的人。面对科技对人类主体性的不断侵蚀，冯内古特倡导人们重新审视科技的弊端，通过发挥艺术的作用进而恢复人类的想象力与主体性。例如，在短篇小说《B36 姐妹》中，作家便透过三个各有所长的外星姐妹隐喻科技对想象力的吞噬。小说中，特劳特创造了一个类似人类生存的地球一样的布布星球，而其中两姐妹一个是画家，一个是短篇小说家，另一个则是讨人厌的科学家。由于嫉妒，作为科学家的妹妹暗下决心，要“使两个

搞文艺的姐姐感到像猫拖进家的死老鼠一样”。于是，三妹发明了电视摄像机、信号发射机和接收器等扼杀想象力的产品，而新一代的布布人由于常年浸泡在不需要动脑的环境中，想象力早已退化，“布布人成了当地星系中最冷酷无情的生物”。借由三姐妹的故事，冯内古特暗讽在科技逐渐扼杀人类想象力之后，艺术地位的没落与人类想象力的逐渐退化。在一次访谈中，冯内古特曾表明过自己对科技的态度，“虽然大我九岁的哥哥伯纳德成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不过于我而言，科技很糟糕。在如此信赖科学、画了那么多梦想汽车、梦想飞机和梦想的人类居所之后，我却目睹了科技被用来摧毁整座城市，夺取十三万五千条生命。”彼时的冯内古特已然预见战后科学技术统治论将会走向失控的局面，并提倡克制方案。“科学从来不能使任何人振奋，人类处境的真实情况实在太险恶。”

四、结语

冯内古特在《时震》中的虚构式书写内容，是他将自己的“自我”式创伤经验投射到文学创作中的具体文本体现。从个体创伤的角度来看，悲惨的家庭经历、二战战场的被俘经历是小说中的主要个体创伤内容；从集体创伤的角度来看，冯内古特将叙事者“我”与主人公特劳特都设定为二战战场归来的老兵，书写战场上敌我厮杀的战争阴影，又以特劳特之笔创作了许多极具隐喻性的短篇故事穿插于文本之中，在自我书写疗愈的过程之中，以反思、审慎的口吻对全社会、全人类加以预言与警示。

参考文献：

- [1] 朱迪斯·赫尔曼·施宏达，陈文琪译. 创伤与复原 [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222.
- [2] 皮埃尔·诺拉编·黄艳红等译.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67.
- [3] 车琳. 西方文论关键词：自我虚构 [J]. 外国文学，2019（1）.

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资助“世纪末的预警：《时震》的创伤性解读”（项目编号：YJSCX2021-064HLJU）。

作者简介：林紫薇，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